

第一章 序論

一、研究動機

南方想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慾望產物。在廣邈的南方想像中，台灣是帝國慾望主軸。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不僅積極投入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近代國家進程，也開始模仿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逐漸展開對外的軍事擴張與殖民主義¹。1895年得到台灣之後，殖民地經營成為日本帝國崛起的第一個考驗。對日本政府而言，台灣統治的成功與否，不僅是日本發展殖民主義的試金石，也攸關日本和歐美列強在亞洲競逐的勢力消長。因此針對台灣統治的對外宣傳，日本在展示其殖民績效、建構台灣的知識論上，一方面採取精密數據的統計模式與博物館學式的展示，以彰顯對台灣的細部監控；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從統治初期刻意形塑台灣的野性氛圍，以呈現日本做為文明啟蒙者的角色。在殖民統治階段，對台灣進行現代化與文明化的工作，持續強調台灣接受日本統治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南進政策正式確立後，台灣更被各種南進論述定位為南進基地的戰略位置。隨著戰爭時局逐漸臻於高峰，更高舉向南方雄飛的熾熱口號，強調以台灣作為跳板，宣揚日本往南躍進的壯志。

日本在占領台灣之後，成為台灣的代言人，把台灣一次又一次再現成為具體的南方。毫無疑問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論述，或是謀取殖民地資源的行動，背後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在支持。明治中期開始，南方作為日本投射帝國慾望的一個想像地理，透過各種文本的鋪陳漸漸建構出一套南進論述。不論是公共政策的社會層面，或是私人意識型態的精神層面，南方論述慢慢滲透成為帝國主義的文化血脈。誠然，這條南方論述系譜可以不必直接和政治權力有關，而可以分別存在於知識性、文化性、道德性的權力之中。藉由殖民地官吏、人類學者、詩人、小說家的各種書寫記錄，日本帝國的南方主義逐漸具體成形²。串連這些不同的領域，顯示文化與擴張的帝國有所牽連。如同西方人用東方主義去建構他們想像的東方一般，日本透過各種論述去形塑他們的南方概念。伴隨日本帝國主義發展

¹ 殖民主義國家會強制將自身的社會文化、宗教和與語言加諸於被征服的民族身上。所以殖民主義（Colonialism）實質上是一個比較強大的國家直接干預比較弱小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系統。雖然殖民主義一詞常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交換使用，但帝國主義一詞較常被使用，因為該詞包括到非正式的對該地區的控制，以及正式的軍事控制或經濟操控作用。

² 透過矢野暢《「南進」の系譜》一書的參考文獻，可以概括日本從明治到昭和時期的各種南進論述，有年鑑、圖書目錄、外交關係資料、雜誌、專論與單篇論文、傳記、地方史、旅行記等文體。請參閱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年6月八版，頁206-220。

下的南方論述，成為一種描述南方、詮釋南方、支配南方的方式。日本對於台灣的無知，逐漸變為複雜而精緻的知識。從而，南方作為帝國慾望的一部分，形成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也體現了文化霸權的無遠弗屆。

在文學書寫上，南方的想像最耐人尋味。島田謹二在《華麗島文學志》詳述明治時期內地文學中所展現的台灣³。就文學生產而言，日本在領台初期，出現許多以台灣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從內容來說可以分為三大類型：一是和征台軍事有關；二是家人渡台不歸（或不得歸），徒留親人在內地的家庭悲劇；三是以前往台灣工作的內地人官吏或民間人士為題材。這些作品的出現，是因為台灣作為日本的第一個海外領地，日本國民對台灣事物產生濃厚興趣。又因為一般大眾對台灣知識相當貧乏，文學者遂利用國民的好奇心，積極以台灣為創作主題，而成為具有特殊類型的想像敘事。島田謹二特別指出四位作家：廣津柳浪、尾崎紅葉、德富蘆花、田山花袋的文學創作，透過他們的台灣觀，轉化成為一般日本讀者的台灣印象，甚至留下深刻的誤解⁴。在看待台灣關係時，日本總是站在有力的一方，縱然作品多屬想像之物，甚至以政治小說的型態出現，卻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露骨展示。這種南方書寫熱潮，在 1904-1905 年（明治 37-38）前後卻突然消退，那是因為日俄戰役將日本國民的目光拉向北方⁵，而稍稍轉移對南方的注意。

誠如島田謹二所言，明治時期的台灣書寫，除了少數幾位作者是參與領台戰役或以官方派遣身分短暫來台而留下詩作短歌，例如森鷗外、正岡子規、渡邊香墨、山田義三郎、伊良子清白等人⁶，其餘多數作品幾乎出於虛構，並非作者親身的台灣體驗。在《華麗島文學志》第六章：「取材自台灣的寫生文作家」，島田謹二提出日治時期以台灣為取材對象的散文作品，亦即內地作家的台灣紀行，當以佐藤春夫的《霧社》為第一位⁷，而他的小說〈女誠扇綺譚〉也是文學傑作，

³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

⁴ 島田謹二，〈明治の内地文学に現われたる台湾〉（明治の内地文學中所展現的台灣），《台大文學》，4 卷 1 號，1939 年（昭和 14）4 月。本文後來收入氏著，《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頁 61-63。島田謹二指出，至於島田謹二重點提出的四位作家廣津柳浪（1861-1928）、尾崎紅葉（1868-1903）、德富蘆花（1868-1927）、田山花袋（1872-1930），都是明治時期的著名作家。

⁵ 日俄戰爭（1904 年 2 月 6 日-1905 年 9 月 5 日）是俄國與日本為爭奪在朝鮮半島和當時的滿州地區（即中國東北）的戰爭。日俄戰爭促成日本在東北亞獲取軍事優勢，並得到在朝鮮、滿洲駐軍的能力。此外，日俄戰爭的陸地戰場是清朝領土的東北地區，而清朝政府卻被逼宣佈中立，甚至為這場戰爭專門劃出了一塊交戰區。

⁶ 除了漢詩作品外，森鷗外也有留下像《能久親王事蹟》（東京偕行社内棠陰會編纂、春陽堂，1908 年 6 月）的領台役人物撰述。

⁷ 關於島田謹二對《霧社》的評價，請參閱氏著，〈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頁 255。關島田謹二的相關研究，將於本論文第五章中探討。另外，可以參考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大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年。

具備冶豔的異國情調。儘管佐藤春夫的旅行者身分，並不符合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所規範的外地作家身分，他還是在《華麗島文學志》以專論分析佐藤春夫的台灣書寫⁸，顯示佐藤春夫對在台日人作家的文學影響是不可小覷。佐藤春夫作為台灣荒廢美系譜書寫的開端，他開啟後輩作家的想像，尤其是中村地平與西川滿，受佐藤春夫的影響至鉅。佐藤春夫也是吸引筆者展開日人作家研究的起點，筆者在博士班階段以佐藤春夫為開端，透過佐藤春夫及其文學影響的探索，進而發現日人作家在塑造殖民地圖像的一條南方系譜。毫無疑問的，日本人的南方觀，指涉廣泛的地理與範疇，尤其在明治時期逐步成形的南進論述中，日本帝國對於南方的慾望越來越膨脹。耐人尋味的是，日本帝國逐步建構的南方論述中，台灣佔據怎樣的位置？本論文圍繞的「南方」，主要聚焦於日人作家的台灣想像之上。無可避免的，在處理這些作家作品時，還是兼論他們對於南洋或是中國的文學書寫，但是台灣作為他們南方想像的親臨原點是無庸置疑的。這些帶有深刻暗示的帝國文本，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史上來檢視，在政治對文學的動員關係上形成深刻的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即在探討從明治中期以降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尤其聚焦在小說與紀行文體。筆者縱貫討論 1910 年代前後乃至 1940 年代的日人作家作品，主要對象包括 1910 年代前後的竹越與三郎、中村古峽，1920 年代的佐藤春夫，1930 年代的中村地平、真杉靜枝，1940 年代的西川滿與《文藝台灣》。在各章節中也涉及作家作品相關的文化脈絡與歷史脈絡。不同歷史階段的書寫，往往呈現不同的南方論述。佐藤春夫以降的台灣書寫，是令人注目的部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1905 年到 1920 年的小說紀行文類，卻是一段文學史上的空白，《華麗島文學志》未深入討論。島田謹二沒有留下記錄，並非代表這段時間沒有出現優秀作品，在此之前，有隱藏的一些線索聯繫著南方書寫的系譜。本文以竹越與三郎與中村古峽為前導者，就是為了彌補這個缺口。這兩位作者雖然另有政治家和心理學者的專業身分，卻和文學界有極深淵源。他們兩位都曾來過台灣，各自創作了極為傑出的台灣相關作品，這是在 1910 年代前後的事，可分別代表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官方觀點與民間觀點的台灣印象。尤其是中村古峽的台灣原住民書寫，並不亞於佐藤春夫。他以忐忑心情在台灣南部展開探險旅程，和佐藤春夫觀光（sightseeing）的現代旅者姿態，誠然具有不同的文學表情。在此之後，才接續討論佐藤春夫，在他的文學影響系譜中，中村地平與西川滿相當鮮明地承繼了他的南方想像。本論文從第三章到第五章，依序探討他們的作品以及佐藤春夫所形成的文學影響。

⁸島田謹二，〈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綺譚』〉（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綺譚』），《台灣時報》，1939 年（昭和 14）9 月。本文後來收入氏著，《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頁 350-385。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釐清這條系譜的南方形象之衍變，並且分析日人作品在南進政策下以台灣為客體的造像過程。會選擇這些日人作家與文本，在於他們各年代的象徵性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成為帝國龐大慾望的指涉對象，在日治時期日人作品中，殖民地想像與南方思維隨著殖民政策的轉變而出現微妙的衍異過程。台灣作為被觀看的南方客體，透過各種話語敘事，從模糊的概念也逐漸顯現清晰的形體。到了南進政策明確的階段，「前進南方」已不再是潛藏在個人內心的集體無意識，它一躍而為昭然若揭的意志、隨處可見的口號。南方的空間範疇，透過大東亞共榮圈與南進政策的帝國宣傳，在日人作品中展演了延伸空間、延長時間的可能。這些作品具體呈現了文化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薩依德說過，創作者的文學生產深深地置身於他們社會的歷史當中，在不同程度上被其歷史以及他們的社會情境所形塑，作品所包含的文化與文學形式衍生自歷史經驗，但這些作者也同時形塑了後者，這是無庸置疑的⁹。

台灣文學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是多重皺摺的，絕對無法把文學單獨處理，而需要藉助更多不同學術訓練來開發文學所負載的繁複而豐富的社會、政治、歷史、語言、文化之暗示。因此，將日人作品用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的觀點來重新解讀是必要的。自二十世紀末以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相關討論，已經能夠擺脫戰後以來的殖民／反殖民二元論的對立觀點，朝向更為繁複而細緻的討論。許多曾經涉及國族認同或是意識型態的禁忌議題，無疑可以透過再閱讀與再詮釋的方式，開放文學觀與史觀的解釋。原始文獻的復刻出版，則彰顯出親近文學原典的重要性。此外，跨越學科的對話，不僅能夠豐富台灣文學研究的內涵，也拓展了多元的思考面向。近年來，學界更進一步將台灣置放在亞洲的空間位置與時間脈絡中討論，以東亞的文化視野來重新審視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生產，儼然標誌出嶄新的研究趨勢。

就東亞文學與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而論，日治時期日人作家台灣書寫的發展，誠然具有複調（polyphonic）的文化意涵。文化自身是一個包含細緻化與提升性要素的概念，它也會被許多政治與意識形態主張在其上彼此相互交涉。這些帶有豐富暗示的帝國文本，和日本從明治時期以降的南進論述，甚至昭和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在政治對文學的動員關係上形成深刻的影響。不可否認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思維與美學形式，乃是衍生自每位作者的歷史經驗。南方作為帝國慾望的一部分，自明治中期以降逐漸在文學之上形成一條「南方」的系譜。追根究柢，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聯繫是極其直接的。釐清這條帝國書寫系譜的南方形象之衍變，不僅有助於分析日人文學在台灣書寫的造像過程，也能窺探

⁹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01年1月初版，頁16-19。

日人作家在南進政策下的文藝協力關係，進一步豐富台灣學界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詮釋深度。筆者也企盼透過再閱讀與再詮釋的方式，以期能填補日治時期文學研究的縫罅。

二、研究背景

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日本和世界維持了相當的距離，德川幕府以鎖國政策隔絕日本與西方之間的聯繫。1853 年美國要求幕府開國並通商，翌年的神奈川條約，日本開啟下田及箱館（現函館）二個港口，鎖國體制從此消解崩壞。西方的入侵促使德川幕府倒台，在短暫的紛亂局勢後，日本展開明治維新，接受西方的現代化思維，並且吸納歐洲的進步思想與科學技術。在歷經徹底改造之後，日本的國力漸進強化，隨之逐步廢除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淪為殖民地的危機。後來分別在中日甲午戰爭（1895）與日俄戰爭（1904-1905）擊敗了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成為新興的亞洲強國¹⁰。日本的振起，在相當程度上也帶給歐洲列強極大的刺激。當時由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擺脫亞洲的落後行列，轉向與歐洲列強共進退，則成為日本遂行帝國擴張主義的思考方向¹¹。而從明治中期以降，日本的有識者開始發展「南進論」，主張藉助「海洋」的力量往南方前進，宣稱南洋是日本人海外進出最合適的地域。為了合理化帝國主義的發展，「南進論」強調，日本前進南方是具有使命性的，目的是要改造南洋的未開發性、政治的落後性；同時也在向歐洲列強宣示，開發海外殖民地不再是西方的特權。

近代日本的未來該往何方？國民的明日將有何企望？這兩個議題，恐怕是從明治以降日本官方與民間有識之士都亟欲找尋的答案。歐洲人的海外拓殖活動，顯然占據了明治時期日本人的目光。在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列強在政治上控制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和幾乎整個非洲。工業革命促進生產率的提高與醫學的進步，卻也造成了歐洲人口的急遽增加，通過海外遷移可以讓人口壓力得到紓解，而歐洲龐大的殖民地系統也因此在此亞非地區建立。相對於傳統的帝國主義，19 世紀歐洲的新帝國主義除了經濟剝削，也攜來了對殖民地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

¹⁰ 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下），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 年，頁 585-589。

¹¹ 福澤諭吉（1835-1901）終其一生都致力於發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觀。1885 年（明治 18）他在《時事新報》發表著名的短文「脫亞論」，主張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應該要體察世界現況，放棄陳腐的儒教文化，轉而學習西洋文明。而位處鄰國的中國與朝鮮，至今仍處於滯怠不進的文化落後狀態，他呼籲要與這種損友般的國家絕交，進一步與歐洲的文明國家共進退。

改變。從而，亞非地區不僅是政治領域的歐化，也是經濟與文化上的歐化。到 19 世紀末為止，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均居於強勢地位，白種人自然認為這是源自於他們文明與種族的優越性，更把開拓海外殖民地視為一種天職，因為他們有義務指導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有色劣等種族。這種論調其實是要合理化歐洲人對於侵略地區的政治干預與經濟剝奪，他們稱之為「白人的責任」¹²。

19 世紀末葉崛起於東亞的日本帝國，透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達到發展近代國家的條件；日本人不僅複製了西方的現代化，也複製了西方的帝國思維。日本明治到昭和期的史學評論家、政治家竹越與三郎在他 1905 年（明治 38）的著作《台灣統治志》，曾經對日本是否具備帝國的政治能力自我提問：「白種人很久以來就相信：拓殖尚未開化的疆土並為其帶來文明的德澤，是他們所要擔負的責任。現在日本國民正從極東的海洋崛起，希望分擔白種人的大任。不知道我國國民果真是否具有完成黃種人的承擔的才幹？台灣統治的成敗，可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試金石。」¹³透過這段話，可以窺探他對台灣統治的信心。他隨後在 1910 年（明治 43）還出版《南國記》，對東南亞各殖民地政情有敏銳的觀察，這本書在當時引起了廣大的迴響，也召喚出許多日本人的南方想像¹⁴。

在竹越與三郎的時代，他只是南進論的支持者之一，當時日本政府內部對於帝國主義的擴張方向，基本上存有「南進」和「北進」兩種不同的論調。在 1874 年，日本先對台灣出兵進而占領琉球。日清戰爭後，除了在朝鮮建立鞏固的地位外，還得到一個殖民地台灣，日俄戰爭的結果則是獲得關東州。1914 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海軍佔領了德屬南洋群島，該區在戰後成為日本的委任統治領地，一時之間南進熱潮也因而突然升高。不過，這個時期在日本國內民間的「南進論」的主調，還要以貿易、投資、移民等和平性經濟進出為前提。誠然，這是頗為理想的說法。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經濟因素是歐洲列強開始向外發展的動機，用「和平」的方式達到經濟進出的目的，並非西方帝國的手段。而日本帝國在擴展過程中，利潤與持續獲利的希望，是相當重要的目標。所以日本人的海外商業活動，其實也得到國家勢力作為後盾¹⁵。這自然是屬於政治力量的干涉，

¹² 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下），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 年，頁 625-633。

¹³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を提す〉（題台灣統治志），《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 年（明治 38）。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台北：南天書局發行，1997 年。關於竹越與三郎的台灣論述，將於本論文第二章中詳細討論。

¹⁴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東京：二酉社，1910（明治 43）年 4 月。此書論述範疇包括了上海、廣東、香港、新加坡、爪哇及荷屬諸島（今印尼一帶）、法屬印度支那、台灣等地。

¹⁵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國內掀起南進熱潮時，台灣總督府也再度推展「南支南洋」政策。除了華南的既有或新設之官方設施外，此時期有些新措施支援南洋的日本私人企業，構想以藉此在南洋擴大日本經濟力。請參閱鍾淑敏，〈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8-159。

也超越了「和平」這一意義。

日本最初的帝國發展策略，基本上是以朝鮮、滿州、中國大陸方向北進，但只要有機可乘就南北並進的擴張領土¹⁶。1931年滿州事變爆發後，雖然日本最後確保了滿州，在中日戰爭及也占領了大陸沿岸一帶，但是當時在國際的地位開始益形孤立。這個時期開始，以武力進出南洋正式成為日本的國家方針。台灣總督府則利用台灣的地利，從事華南與東南亞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把國境南端的領土台灣當作南進基地，作為進攻東南亞的基石。「南進論」的目的，最初雖然是以解決日本國內的經濟問題以及發展海外拓殖為主，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演變為基本國策，透過公共論述的直接介入，「前往南方」逐漸成為日本人的集體意志。從而它的傳播系譜，也不只侷限在國家的政治宣傳之上，而牽涉到龐大知識體系的運作；在各種專業領域上，透過人類學家、科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家、醫學家、作家、畫家、探險家所生產的「南方」文本，包含了人種調查與田野報告、科學研究、政治評論、新聞報導性文件、地圖、熱帶病研究、文學作品、殖民地風景畫、旅遊手冊等，這些不同領域的文本可以相互引用、指涉到彼此，而逐步形構了日本帝國的南進論與南方學。

就日本的文學生產而言，隨著明治到昭和時期「南進論」的形塑過程，混沌未明的南方形象也透過作家的文字書寫而漸具雛型；一個需要被征服、被開拓、被啟蒙的「南方」儼然浮現。從1880年代後期起，日本出現了以南洋為舞台的冒險故事¹⁷。猶如十九世紀的歐洲探險家，他們相繼進入非洲，對非洲進行系統性的探險，後來還成為殖民者並從中獲取無盡的利益。歐洲的傳道士，則對非洲的文化具有深遠的影響，他們運用了三大工具：教育、醫學與宗教，改變了非洲人的生活方式¹⁸。歐洲的文學家也發揮豐富的文學想像，他們或許是大張旗鼓書寫冒險小說，或許是借助謳歌非洲以唾棄文明、回歸自然。旅行與探險的各種書寫在十九世紀後葉，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無可否認的，現代旅行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擴張有密切的關聯。在現代旅行尚未普及的明治時期，對不曾踏出國土的日本人來說，閱讀冒險小說是想像世界的一種方式。日本在二十世紀初，透過媒體的策畫與宣傳，海外旅遊逐漸成為大正時期日本國民休閒生活的一部分，而殖民地台灣正是海外旅遊活動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¹⁹。位於西太平洋上的亞熱帶島嶼

¹⁶ 請參閱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鴻儒堂，2003年8月，頁177-180。

¹⁷ 以南洋為舞台的冒險故事，從1880年代後期到1890年代中，所謂的「南進小說」及「海洋小說」被歸為政治小說的一類而在日本國內享有頗高的人氣。關於日本在明治時期以降較具代表性的南方書寫，請參閱Faye Yuan Kleeman（阮斐娜），*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在帝國的太陽之下：台灣與南方的日本殖民文學），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 11-17.

¹⁸ 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下），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年，頁591-603。

¹⁹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

台灣，在 1895 年成為其殖民地之後，不但讓日本擠身帝國的行列，並初嚐殖民者的支配手段，透過制度化旅行的形成，台灣更提供他們一個描繪南方的具體模型。中村古峽於 1913 年（大正 2）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的〈到鵝鑾鼻〉，是他該年到台灣屏東原住民部落的旅行紀錄²⁰。1916 年（大正 5）刊登在《中央公論》的〈來自番地〉，可以說是〈到鵝鑾鼻〉的續篇，也是首篇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在日本綜合性雜誌發表的作品²¹。這篇紀行文體的小說，描繪主角到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部落旅行。從獵奇到凝視，中村古峽的旅行書寫不僅是異國情調（exoticism）的細膩再現，也深具帝國的文明視線。

不論是明治時期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或是大正時期中村古峽屏東紀行〈到鵝鑾鼻〉或是異國情調小說〈來自番地〉，都不斷指涉出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帝國主義的海外擴張。南方與蠻荒的殖民地意象，是他們作品中共存的部份；他們的台灣書寫，展現了盎然趣味與異國情調，對日本讀者有其美學與報導的效果。但是在原住民的野性描寫部分，也有可能加深日本人對台灣的刻板印象。竹越與三郎與中村古峽的作品，分別可以代表日治初期官方觀點與民間觀點從發現到建構台灣的認識論，它們更具體而微地展現了日本人的帝國慾望與南方想像。

不過，以台灣原住民題材為日本讀者帶來廣大影響的作家，還是佐藤春夫的台灣紀行作品。1920 年（大正 9）的夏天，佐藤春夫來台散心，返日後創作了一系列台灣相關作品。如果借用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不難看出佐藤春夫的台灣書寫，尤其是在原住民的刻畫部分，除了帶有越境的異國情調之外，也展現了近代人的文化視域與殖民者的帝國凝視；這些文本蘊含豐饒的隱喻，深具探討價值。筆者在 2006 年以佐藤春夫的閩台紀行與東亞體驗為研究主題，赴日本東京大學執行國科會千里馬計劃，獲得深入研究佐藤春夫的機會。透過日本學界對佐藤春夫的研究成果，以及佐藤春夫的相關文獻，理解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對於日人作家的影響關係，進而發現日人作品在建構台灣認識論的一條南方系譜。所謂「台灣」或者「南方」是如何被發現、認識的？又是如何形成一套投射帝國慾望的話語論述？關於這個認識論的生成背景，顯然涉及了政治干預的力量，並且與日本帝國的海外擴張與南進政策相伴而生。進一步探討，尚且可以窺知佐藤春夫只是這個論述的一位中繼者，該系譜的形成，還能往上、往下追溯至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的各種殖民地／南方敘事。

347。

²⁰ 中村古峽（筆名古峽生），〈鵝鑾鼻まで〉（到鵝鑾鼻），《東京朝日新聞》，自 1913 年 6 月至 7 月 5 日連載，共 16 回（6 月 21 日沒有連載）。

²¹ 河原功，〈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日本人看到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東京：国書刊行会，2003 年，頁 61-86。

從 1920 年代開始，以佐藤春夫為首的台灣書寫，在後輩作家當中逐漸形成一條文學系譜，如果深入挖掘，這個系譜顯然還有擴大的可能。自佐藤春夫以降的日人作家，諸如中村地平、真杉靜枝、西川滿與《文藝台灣》集團的創作，可以逐步勾勒出一條南方敘事的系譜，這也是筆者選擇文本的一個重要條件。從他們的台灣相關作品，可以發現在文本與文本之間，殖民地台灣與南方的意象發展出繁複的歧義與隱喻。從而，筆者也盡量避免以單一的歸類來看這些文本，不論是文學或是藝術創作，每一個文本都是獨特的，它們再現的意義不僅具有差異性，而其文化意涵也是混雜、綜合、非純粹的。本文研究的主要企圖，就在於讓這條南方敘事逐漸浮出文學地表。筆者以為，釐清這條系譜的時代背景與歷史脈絡，不僅有助分析日人作品對殖民地的造像工程，也能側面窺探日本帝國在南進政策的操作手段，進而豐富台灣學界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詮釋方式。而將這些文本置放於當時的歷史脈絡下來分析，亦可看出其中所蘊含的知識傳播與權力的結構關係。

三、相關研究文獻

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文學創作，從最初的中、日文並用到戰爭期以日文為主的文藝政策，半世紀以來的台灣文壇歷經政治動盪，而呈現出錯綜弔詭的文學風貌與作家集團，在台灣文學發展史上占據重要的位置。然而，二次戰後的政權轉換，致使日治時期以來的文學發展旋即遭到中斷。相對的，這段時期的文學討論也被封閉近半世紀之久。1987 年解嚴前後，在台灣社會開始追求主體性的同時，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也逐漸受到學界的矚目。但是就殖民時期的日文作品而言，受限於語言阻礙，獲得較多注意的，還是以被翻譯的台人作品為主。在日人作品方面，以西川滿為例，即使他是頗受到關切的一位，得到張良澤、陳明台等學者的注目，但他在日治年代的作品也只有少數獲得譯介，遑論其他日人作家文學的翻譯。關於日治時期的日人作品研究，戰後在台灣政治環境與語言因素的雙重困境下，主要的先行研究，最初還是來自日本學界。

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出版於 1995 年²²，但是其中的多數文章幾乎是完成於日治時期的 1930 年代末期至 1940 年代。這本書可以說是最早也最完整討論日本自明治時期以來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之專著，雖然多側重在詩人討論，不過關於日治時期日人文學所呈現的台灣，已有概括式的介紹，尤其島田謹二對

²²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 年。

於外地文學論的重要觀點，也都充分反映在書中各篇的論述。《華麗島文學志》各文章的原始出處多在《台灣時報》，不過《文藝台灣》在創刊之後，島田謹二也在這本刊物先後發表了〈外地文學研究的現狀〉、〈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Jean Marquet 的法屬印度支那小說—外地文學雜話(1)〉、〈台灣寫生派俳句的前輩們—外地文學雜話(2)〉、〈Robert Randau 的第二代小說—外地文學雜話(3)〉〈文學的社會表現力〉等評論文章²³，陸續衝擊日人作家的文學方向。這些文章不失為補充《華麗島文學志》的重要論述。

從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以降，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蜂矢宣朗的《南方憧憬——佐藤春夫與中村地平》、河原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藤井省三的《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岡林稔的《南方文學的光與影：中村地平試論》等專著，代表了戰前到戰後日本學者對於日治時期日人文學的研究觀點²⁴。上述各書的研究範疇，包括佐藤春夫的台灣書寫，以及中村地平、真杉靜枝、西川滿、大鹿卓等人的台灣相關作品，也注意到佐藤春夫對於後輩作家的影響。在這些先行研究者當中，戰前提出「外地文學論」的島田謹二，他的殖民者中心主義誠然可議，但是如尾崎秀樹、河原功、藤井省三的論述，已嘗試用對位的角度來檢視殖民地經驗，其中也涉及了歷史評價與殖民批判。而蜂矢宣朗在退休後，依然汲汲營營於研究，再度發表了《續灣生之記》，裡面收錄兩篇關於中村地平和真杉靜枝的論文，他可以說是研究中村地平的開創者，而且也是相當有毅力的一位研究者²⁵。此外，在日本文學方面，柄谷行人的

²³ 島田謹二，〈外地文學研究の現狀〉（外地文學研究的現狀），《文藝台灣》，創刊號，1940年（昭和15）1月1日，頁40-43；〈台灣文學の過現未〉，（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藝台灣》，2卷2號，1941年（昭和16）5月20日，頁3-24；〈ジャンマルケエの佛印度小説—外地文學雜話(1)〉，（Jean Marquet 的法屬印度支那小説—外地文學雜話(1)）《文藝台灣》，3卷1號，1941年（昭和16）10月20日，頁36-39；〈台灣における寫生派俳句の先達—外地文學雜話(2)〉，（台灣寫生派俳句的前輩們—外地文學雜話(2)）《文藝台灣》，3卷2號，1941年（昭和16）11月20日，頁58-63；〈ロベエルランドオの第二世小説—外地文學雜話(3)〉（Robert Randau 的第二代小説—外地文學雜話(3)）《文藝台灣》，3卷6號，1942年（昭和17）3月20日，頁36-38；〈文學の社會表現力〉，（文學的社會表現力）《文藝台灣》，5卷1號，1942年（昭和17）10月20日，頁5-15。

²⁴ 各書的出版資料分別為：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年；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6月初版（本書已有中文版：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12月）；蜂矢宣朗，《南方憧憬——佐藤春夫と中村地平》，台北：鴻儒堂，1991年；河原功著，《台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點》，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11月初版（本書已有中文版：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年3月初版）；藤井省三著，《台灣文學の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年5月初版（本書已有中文版：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2004年8月初版）；岡林稔，《「南方文學」その光と影：中村地平試論》（南方文學的光與影：中村地平試論），宮崎：鉦脈社，2002年。

²⁵ 請參閱，蜂矢宣朗，《続続 灣生の記》，作者自印，2000年。這本書是作者自印，也沒有收藏在一般的圖書館，筆者是在日本新宿的財團法人台灣協會藏書室中印出的，書裡收錄了兩篇論文，分別是〈中村地平と濱田隼雄——『霧の蕃社』と『南方移民村』〉（中村地平與濱田隼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東京：岩波書店，2004)、川本三郎的《大正幻影》(東京：筑摩書房，1997)，可以看出近代性與當代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川本三郎以美學、文學地裡的角度來探討大正時期的作家如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等人。他們的研究範疇上在相當程度上也觸及了本論文所指涉的文學年代。

至於台灣方面，葉石濤可以說是起步相當早的一位評論者，但是都以散論為主，並非系統性的討論²⁶。專書出版則有邱若山的《佐藤春夫台灣旅行關係作品研究》(日文)²⁷。此書除了探討佐藤春夫的旅台行程與路線，後半部在於個別分析他的四篇作品〈旅人〉、〈霧社〉、〈女誠扇綺譚〉、〈殖民地之旅〉所呈現出來的創作觀與歷史觀。另外，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的《在帝國的太陽之下：台灣與南方的日本殖民文學》，此書論及在「大日本帝國」的建構過程中不同身分位置的作家所形塑出來的殖民地文學與南方想像。全書以三大部組成，分別論述在日治時期短期滯留台灣的日本作家、長期居住台灣的日本人，以及台籍作家的台灣書寫。在第一部「描繪帝國」，談到日本對於「南方」的概念以及南洋想像，並透過台灣原住民與歷史事件的關係，分析原住民形象，除了涉及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等作家之外，也探討了殖民主義與帝國文本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則專論西川滿文學與《文藝台灣》，探討西川滿的殖民地書寫與浪漫主義。第三部則是以台人作家的日本語文學為主²⁸。此書可以說是最貼近本論文研究主題的一部專著，尤其是第一部關於日本人作家的南方書寫和台灣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敏銳地觀察到日本作品的南方系譜之形成，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在歷史學的討論，尤其是南進論的形成，矢野暢的研究《「南進」の系譜》和《日本の南洋史觀》，啟發筆者良多²⁹。矢野暢的童年時期曾經在滿州住過十年，

雄——『霧之蕃社』與『南方移民村』、〈真杉靜枝と台湾——『むすめ』と『ながれ』から〉(真杉靜枝與台灣——從『少女』與『流』談起)。

²⁶ 葉石濤在解嚴前的1987年，即出版了堪稱台灣文學研究經典的《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但是此書關於日治時期的文學評論是以台籍作家作品為主。不過葉石濤在其它的文學評論集中，或多或少有觸及到日籍作家作品的討論，例如〈庄司總一的「陳夫人」〉、〈南方移民村〉(收入《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春暉，1990年)；〈「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收入《走向台灣文學》，台北：自立晚報，1990年)；〈敬悼西川滿先生〉、〈「陳夫人」中文譯本問世〉(收入《追憶文學歲月》，台北：九歌，1999年)。

²⁷ 邱若山，《佐藤春夫台灣旅行關係作品研究》，台北：致良出版社，2002年；該書是以其碩士論文為基礎所完成的：《佐藤春夫研究—台灣旅行もの・「旅びと」を中心に—》(佐藤春夫研究—以台灣旅行作品「旅人」為中心)，日本筑波大學博士課程文藝言語研究科中間評価修士論文。邱若山也是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文化，2002年9月初版)的翻譯者。

²⁸ Faye Yuan Kleem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在帝國的太陽之下：台灣與南方的日本殖民文學),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本書另已發行日文版：林ゆう子譯，《大日本帝国のクレオール：植民地期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7年11月初版。

²⁹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年6月八版；《日本の南洋史觀》，東

所以稍能理解戰前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生態，也對此議題抱持興趣。後來他從事東南亞研究，在 1964 年還跑到馬來半島的一個回教村進行調查，在那裡和村民生活了兩年，這個經歷對他往後的影響很大。他在《「南進」的系譜》中指出，日本在江戶時代就有南方經略論，不過是屬於思想史的範疇。日本在成為近代國家後所出現的「南進論」，要到明治 20 年代（1887 年以降）才出現。然而，明治中期所展開的「南進論」，是來自在野的、民間的聲音，而且是平和地經濟進出南洋為考量之下的善意思想。包括本論文第二章所提出的竹越與三郎，史野暢認為他從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投身於新聞工作，因此把他的南進論歸類為發自民間的思想，和官方並無關係³⁰。

針對這一點，筆者認為，有關對竹越與三郎的定位與評價，還是要把《台灣統治志》和《南國記》並置討論才能彰顯其意義。在第二章的論述中，我把竹越與三郎視為官方觀點的代表，和矢野暢持相反看法。從竹越與三郎受邀撰寫《台灣統治志》到《南國記》所展現的帝國觀察視域，他和日本官方的關係應該相當密切，甚至可以說是代表官方立場。矢野暢在《「南進」的系譜》當中的發言，顯然忽視了竹越與三郎後來進入政壇的事實，也沒有釐清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不過，矢野暢在 1974 年又另外出版了《日本的南洋史觀》，這本書的主題和《「南進」的系譜》相當類似，討論的範疇也非常接近。在這本書裡，他提到明治時期的七位「南進論」者，竹越與三郎自然也在其中。矢野暢在書中指出，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則是讓日本大眾階層對「南進論」普及認知的開山之作，原因除了作者的知名度之外，還包括竹越與三郎的文章與文體的魅力。這些論點是重複的，他在先前的書中已經說過。不過，在《日本的南洋史觀》他不再言及關於竹越與三郎的發言立場問題，反而加重日本帝國主義與南進論之間的關係。這應該可以解讀為：矢野暢或多或少修正了他之前的論點。無論如何，他在「南進論」系譜的發現，其歷史價值是值得肯定的。

日本學界關於殖民時期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包括小熊英二的《日本人的境界》、駒込武的《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松田京子的《帝國的視線：博覽會與異文化表象》、山路勝彥的：《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無主的野蠻人」論述之展開》和《近代日本の殖民地博覽會》³¹等專書。他們的研究提供了殖民政

京都：中央公論社，1979 年。

³⁰ 請參閱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 年 6 月八版，頁 48-78。

³¹ 小熊英二，《日本人的境界》（日本人的境界），東京：新曜社，1998；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7；松田京子，《帝國の視線：博覽會と異文化表象》（帝國的視線：博覽會與異文化表象），東京：弘文館，2003；山路勝彥，《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無主的野蠻人〉論述之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2004 年；山路勝彥，《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博覽會》（近代日本の殖民地博覽會），東京：風響社，2008 年。

策的文化統合策略分析，也有透過文化人類學的眼光來檢視台灣原住民被人種展示的文化意義。而關於博覽會的近代性形象與帝國權力的建構，亦是近年來相當炙手可熱的議題。台灣方面，呂紹理的《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分析了殖民政府的博覽會活動，伴隨旅遊活動的逐漸普及，台灣的地景與社會都被納入到展示體系當中，其中也涉及了殖民知識的權力操作。陳培豐的《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則透過日治時期同化教育的分析，有關近代化論述和實際政策內容以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探討近代台灣人認同意識之內涵、特質及意義³²。他們都細膩分析了殖民政策的操作手段，透過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跨學科的對話，帶給本論文許多嶄新的視野。

此外，由於本文探討的文本有許多是紀行文作品，近代旅行的成立，誠然和帝國主義的擴張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旅行的過程，往往也牽涉到文化翻譯與文化差異的觀感。在旅行研究專書方面，有約書亞答·福格爾（Joshua A. Fogel）的《重新發現中國的日本人旅行文學，1862-1945》，此書針對 1862 年到 1945 年之間，日本人到中國旅行的文學作品有深刻的分析³³。而瑪莉·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e）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一書，則專門探討旅行書寫與帝國凝視之間的權力關係³⁴。透過近代旅者的文化視域，跨越國境的旅行不僅是對異地、異國情調的文化體驗，也可能帶來帝國的凝視與他文化的刻板再現。顏娟英所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³⁵，收錄 137 篇翻譯文章及日文文獻原件，涵蓋了日治時期的新聞與雜誌上，畫家發表的台灣風景印象記、台灣美術展評論、畫家美術論、台灣畫壇回顧等文章，可以看出日人與台人畫家的藝術特色，也能詳細回顧在日人畫家凝視下的台灣風景與地方色彩。

在學位論文方面，這些成績多以文學與歷史領域為主，包括：蔡宗明，《庄司總一的『陳夫人』》（東吳大學日文所碩士論文，1992 年）；陳藻香的碩論《野

³²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2005；陳培豐著，王興安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2005（此書原為日文版：《「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都：三元社，2001 年 2 月初版）。

³³ Joshua A. Fogel（約書亞答·福格爾），*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重新發現中國的日本人旅行文學，1862-18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⁴ Mary Louise Pratte（瑪莉·路易斯·普拉特），*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2.

³⁵ 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冊：顏娟英譯著；下冊：顏娟英譯著、鶴田武良譯），台北：雄獅美術社，2001 年。本書內文分七大主題：風景心境、青春少年時、評論官展、接力演出、個人風格、生活美術、台灣美術論，每一主題前並有導讀文章，介紹分析相關之美術史文獻特質。書末附有詳細人名、團體組織、美術文化用語之名詞解釋及索引，可提供該時期之美術、社會、歷史發展研究。

上彌生子の台灣觀：紀行「臺灣」を中心に》，（東吳大學日文所碩士論文，1991年）與博論《日本領台時代の日本人作家：以西川滿為中心》（東吳大學日文所博士論文，1995年）；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黃宗彬，《台灣日治時期文學作品研究：庄司總一之「陳夫人」》（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日本統治時期臺灣 1940年代的濱田文學》（成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0年）³⁶；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賴玲秀，《中村地平の南方憧憬——台灣関連作品を中心に》（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2004年）、阮文雅，《中村地平研究：「南方文學」の理想と現實》（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位請求論文，2005年）、李文茹，《帝國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間情報科研究科，2004年。）等論。透過這些資料不難發現一個特定的現象，那就是論文生產者多為日籍留學生或台籍日文系研究生，反映日治時期研究的一個趨勢。

至於在單篇論文上，多分別涉及本論文各章節討論的範圍，可以增補研究觀點上的視野。例如張隆志的〈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台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該篇論文主要側重在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和後藤新平治台政策之間的關係。據筆者所知，是近年來首次以竹越與三郎為主題的研究論述，本論文為張隆志在國科會「世變中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整合型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尚未完全公開³⁷，也期待他的研究成果。而日本學者河原功的〈日本人看到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也是到目前為止僅有一篇提到中村古峽的研究。他指出，發表在1916年7月號《中央公論》中村古峽所創作的〈來自蕃地〉，就日本的商業性綜合雜誌而言，可說是首篇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³⁸。不過這篇論文較偏重在佐藤春夫作品的原住民再現，中村古峽的介紹篇幅不多，也沒有涉及他另一篇紀行〈到鵝鑾鼻〉。本文第二章將以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為基礎，涉入更廣泛的探索。

歷史事件的討論中，由河上丈太郎與河野密合著，刊載於1931年（昭和6）

³⁶ 該論文後來出版專書，請參閱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文學創作於台灣 1940-1945》（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7年）

³⁷ 請參閱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台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1895-1945）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台文所、音樂所主辦，2005年11月26日。（本論文為張博士在國科會「世變中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整合型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論文初稿僅供討論，不得引用。）

³⁸ 河原功，〈日本人の見た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峽と佐藤春夫〉（日本人所見的台灣原住民——中村古峽與佐藤春夫），收入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東京：国書刊行會，2003年，頁61-86。

3 月號《改造》的〈談霧社事件的真相〉³⁹，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史料。這篇文章是日本國會眾議員河野密、河上丈太郎來台調查，隨即發表在 1931 年 3 月號的《改造》。這篇文章客觀探討日本殖民統治中理番政策的缺失，以人道的觀點來檢討霧社事件相當，具備批判意識。在霧社事件發生之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它就能夠在日本刊物《改造》上公開發表，作者分析霧社事件的因果關係，也絕非見容於日本官方，這個文章顯然已超脫研究論文的價值，而是一篇彌足珍貴的歷史證言。

文學方面的期刊論文，先介紹日本學者方面的成果。中島利郎的歷年研究，多以蒐集與整理刊物索引，並進行解說或解讀的工作，可以說是日本統治期台灣研究的深耕者之一。近年來他寫了兩篇論文，著重討論西川滿和「台灣詩人協會」、《文藝台灣》的成立經過，相當值得注意。2005 年發表的〈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日本人作家的抬頭——西川滿與「台灣詩人協會」的成立〉，論者以西川滿策劃「台灣詩人協會」的成立及其機關誌《華麗島》的創刊為關鍵，標誌出以台灣人作家為中心的台灣文學界轉向了以日本人作家為中心的階段。2006 年發表的〈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成立與「文藝台灣」——從西川滿「南方的烽火」談起〉⁴⁰，則透過「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會員組織，分為「贊助員」、「贊助會員」、「普通會員」。西川滿刻意拉攏內地文藝家和島內有影響力的日本文人參與，以凸顯自己的人脈，並達到掌控《文藝台灣》的目的。這兩篇論文，可以說是中島利郎近年來相當出色的論述。他先以「台灣詩人協會」與「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成立經緯為切入點，探討西川滿主導下的台灣文壇。在文中觸及到內地作家與在台日籍作家在協會中的功能性配置，可以看出論者相當熟悉當時的文壇狀況，不僅是突破性的研究，也極具史料價值。

以下要介紹的六位論者，都是台灣出身的女性研究者。黃美慧可說是最早在台灣觸及佐藤春夫議題的學者，在 1992 年所發表的〈佐藤春夫與台灣中國：大正九年的台福之旅〉⁴¹，考察佐藤春夫的閩台行程，也比較出兩地之旅的差異性。姚巧梅近年來則積極在日本發表研究，她寫過〈西川滿與台灣〉、〈濱田隼雄與台灣〉，此外則是一系列佐藤春夫評論：〈「女誠扇綺譚」的評價與佐藤春夫文學的

³⁹ 河上丈太郎、河野密，〈霧社事件の真相を語る〉（談霧社事件的真相），《改造》，1931 年（昭和 6）3 月号，頁 121-132。

⁴⁰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日本人作家的抬頭——西川滿と「台灣詩人協會」の成立〉（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日本人作家的抬頭——西川滿與「台灣詩人協會」的成立），《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外国語学部編，第 44 集，2005 年，頁 43-54；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芸家協會」の成立と「文芸台灣」——西川滿「南方的烽火」から〉，（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成立與「文藝台灣」——從西川滿「南方的烽火」談起），《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外国語学部編，第 45 集，2006 年，頁 91-108。

⁴¹ 黃美慧，〈佐藤春夫與台灣中國：大正九年的台福之旅〉，《東海學報》，第 33 卷，1992 年 6 月，頁 167-183。

現況〉、〈試論「女誠扇綺譚」の組成〉、〈閱讀佐藤春夫台灣作品「女誠扇綺譚」を読む——以「我」與世外民為中心〉、〈佐藤春夫與台灣——以「指紋」、「都會的憂鬱」、「女誠扇綺譚」為中心〉、〈在佐藤春夫文學裡中國・福建的地位——以『南方紀行』為中心〉⁴²。姚巧梅對於佐藤春夫的研究，頗為留意他在來台前後之間的轉變。她指出，佐藤春夫在旅台之後，除了創作量明顯增加之外，在作品內容上也開始展現對社會與人類的關心，這在他初期的作品〈田園的憂鬱〉是看不到的。〈田園的憂鬱〉只注重個人內心世界如孤獨、倦怠等感覺的刻劃，〈都會的憂鬱〉則表現了對他者的同理心與冷靜的自我分析，姚巧梅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應該和佐藤春夫在大正九年的台灣、中國之旅有密切的關係。在經歷了台灣和中國的風土、人情、現實社會之後，對佐藤春夫的心境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也讓他將注視自我的目光轉向人間。

另一位研究者阮文雅，則集中於中村地平の討論。除了博士論文之外，她也集中以日文方式發表，主題都圍繞在中村地平台灣相關作品：〈憧憬與嫌惡交錯の地平——以中村地平「熱帶柳の種子」為中心〉、〈論中村地平「鼯鼠先生也突然倒下」——「故郷」回歸與「南方文學」之創新〉、〈中村地平「霧之蕃社」——重疊的困境〉、〈中村地平「蕃界之女」與佐藤春夫「旅人」——作品中關於「南方憧憬」的視線〉等專論⁴³。阮文雅的詮釋觀點，比較傾向以正面的視角來檢討中村地平對於台灣的再現問題，而筆者則是採取批判性閱讀的態度。不過，筆者相當肯定阮文雅對於中村地平の嚴謹研究精神，她也是以貼近閱讀的方式，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在日本學者蜂矢宣朗、岡林稔的研究基礎上，阮文雅展現了更

⁴² 各論文發表於：姚巧梅，〈西川滿と台湾〉（西川滿與台灣），《曙光》，第7号，1996年12月，頁85-92；姚巧梅，〈濱田隼雄と台湾〉（濱田隼雄與台灣），《曙光》，第9号，1998年，頁107-112；姚巧梅，〈「女誠扇綺譚」の評價と佐藤春夫文學の現況〉（「女誠扇綺譚」的評價與佐藤春夫文學的現況），《曙光》，第11号，2000年，頁100-115；姚巧梅，〈「女誠扇綺譚」の成立をめぐる試論〉（試論「女誠扇綺譚」的組成），《曙光》，第12号，2001年，頁72-84；姚巧梅，〈佐藤春夫台灣物の「女誠扇綺譚」を読む——「私」と世外民を中心に〉（閱讀佐藤春夫台灣作品「女誠扇綺譚」——以「我」與世外民為中心），《日本台灣學會報》，第三號，2001年5月，頁89-102；姚巧梅，〈佐藤春夫と台湾——「指紋」「都會の憂鬱」「女誠扇綺譚」を中心に〉（佐藤春夫與台灣——以「指紋」、「都會的憂鬱」、「女誠扇綺譚」為中心），《解釈》，598・599号，2005年1・2月，頁19-26；姚巧梅，〈佐藤春夫文學における中國・の福建位置——『南方紀行』を中心に〉（在佐藤春夫文學裡中國福建的地位——以『南方紀行』為中心），《皇學館論叢》，第38卷第2号，2005年4月，頁52-68。

⁴³ 各論文發表於：阮文雅，〈憧憬と嫌惡が交錯する地平——中村地平「熱帶柳の種子」を中心に〉（憧憬與嫌惡交錯の地平——以中村地平「熱帶柳の種子」為中心），《東吳日本語教育學報》，第25期，2002年7月，頁279-207；阮文雅，〈中村地平「土竜どもぼっくり」論——「故郷」回歸と「南方の文學」の創出〉（論中村地平「鼯鼠先生也突然倒下」——「故郷」回歸與「南方文學」之創新），《近代文學試論》，第40号，2002年12月，頁61-69；阮文雅，〈中村地平「霧の蕃社」——重疊的なジレンマ〉，〈中村地平「霧之蕃社」——重疊的困境〉《現代台灣研究》，第24号，2003年3月，頁38-53；阮文雅，〈中村地平「蕃界の女」と佐藤春夫「旅びと」——作品における「南方憧憬」のまなざしを巡って〉（中村地平「蕃界之女」與佐藤春夫「旅人」——作品中關於「南方憧憬」的視線），2005年日語教學國際會議論文集，2005年，頁233-249。

為周延的研究方法。

關於真杉靜枝的討論，吳佩珍的〈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是透過〈南方的語言〉這篇小說，分析日本領台以來語言教育政策的執行以及內台結婚問題的糾葛。論者指出，這篇小說不但脫離我們當時對殖民地語言政策印象的常軌，也反映性／別問題；內台結婚問題與語言政策執行的密切關係。李文茹的〈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則以真杉靜枝發表於中日爆發後的作品進行論證，探討日本女性作家如何透過自發性的行動，來協助帝國的殖民論述，以及如何介入男性社會體制⁴⁴。這兩篇專論，也是近年來台灣探討真杉靜枝的稀少之作。真杉靜枝在戰前的文學活動頗為密集，但是戰後所得到的文學評價並不高，她的作品也相對的不受重視。對日本文壇來說，她的感情生活顯然比文學才華更為可觀，唯一較屬正面的傳記，應該是由她的家人委託十津川光子所寫的《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歡生涯》⁴⁵。不過，林真理子以真杉靜枝為主人公所寫的《女小說家》，倒是提出一些中肯的說法。其中在傳記裡言及真杉靜枝無法在文壇立足的原因，還是出於文學產量，也和本身才華有關⁴⁶。真杉靜枝的文學成就該如何評價，在這兩篇論文出現之前，台灣學界尚未引起討論，因此需要慎重研究之後才能定論。不過，將她的作品置放在大時代的歷史脈絡下審視，能夠忠實反映日本殖民時代下的在台日籍女性身影，則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促成這篇論文對真杉靜枝作品的研究動機。而吳佩珍與李文茹的後續研究，值得密切關注。

朱惠足也是從日本留學回台的年輕研究者，近年來的研究議題和本論文相關的三篇論文，分別針對1940年的日人長篇小說：西川滿的《臺灣縱貫鐵道》、庄司總一的《陳夫人》、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進行文本比較。例如在〈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一文中，以殖民現代性的角度比較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帝國下的漢人家族再現：滿州國與殖民地台灣〉，則是比較台灣出身日人作家庄司總一的《陳夫人》、滿州和人作家梁山丁的《綠色的谷》、台灣漢人作家呂赫若的〈合家平安〉，將這三部作品用對位式的閱讀方式。檢視家族與民族書寫與殖民時期的移墾歷史、帝國下多重翻譯與現代性建構，存在怎樣錯綜複雜的關係。〈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農業移民：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探討由日本內地到台灣東部的農業移民的主體性，所謂的海外拓殖移民政策，也和日本

⁴⁴ 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63-80；吳佩珍，〈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45-62。

⁴⁵ 十津川光子，《惡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哀しみの生涯》（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歡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年。

⁴⁶ 林真理子，《女文士》（女作家），東京都：新潮社，1998年，頁37-38。

內部因資本主義所引發的人口問題有關⁴⁷。以論者的日文能力，討論 1940 年代的日文作品可說是駕輕就熟。這三篇論文和本文第六章的研究範疇相近，並且嘗試用跨學科的研究方式釐清文本的歷史脈絡，提供本文極多研究資料。

透過前人的研究基礎，本文計畫以作品原典為基礎，包括日治時期文學創作者的紀行、文稿，以及官方文書，還有當時日本官方報紙和民間報刊、文化雜誌等原始資料的掌握，以重新詮釋日據時期日人作家的書寫策略。藉由本論文的完成，相信可以展開歷史文獻與前行研究的交互辯證，並且將殖民地時期日人文學的發展軌跡置放在帝國知識與殖民論述的脈絡中進行考察，進而增補文學史上的遺珠之憾。

四、研究取徑

本論文的研究取徑，一是文本閱讀，一是理論運用。

進行研究工作之前，參考書目的蒐集與建檔，誠然是一項基本工作。本文的史料來源，在台灣方面以國家圖書館、台灣大學總圖書館、中研院各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等館館藏為主。此外，筆者也透過了東京大學圖書館與日本國會圖書館館藏，蒐集到明治至昭和時期的相關期刊文獻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發展與南進論述的專書。這些資料的獲得，應該可以增補國內各圖書館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研究典藏的不足之處。而日本新世代研究者的學術成果，更是參考書目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對照台灣學界對日治時期台人作品研究日益繁盛的情況，有關日人作品的討論則是占相對少數，因此日本學界的研究發表是極為重要的參考基礎。日本方面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相關討論，在解讀上不僅提供筆者分析日人文本的多重視野，在詮釋觀點上也能透過這些前行研究和日本學界進行對話。進一步比較日本與台灣的論點，尚可發現在研究方向與解釋觀點的差異性。用研究史的角度來觀察殖民政策與日人作品被討論的衍變，也能釐清台日學界對於殖民文學的歷史評價。

文學文本與歷史材料的細讀（close reading）與再閱讀（re-reading），不僅是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也是最基礎的研究工作。筆者將以日治時期日人作品原典的再閱讀為基礎，並且對照當時文藝社團與文學創作的發展，藉此窺探帝國主

⁴⁷ 朱惠足，〈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第 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11-140；朱惠足，〈帝國下的漢人家族再現：滿州國與殖民地台灣〉，《中外文學》，第 445 期，2008 年 3 月，頁 153-194；朱惠足，〈帝國のロマンチズムと内地人農業移民：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農業移民：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南臺應用日語學報》，第 3 期，2003 年 6 月，頁 148-162。

義、文化與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通過細緻的文本閱讀，來解釋美學上的歧異與衍異；研究過程最為耗時之處莫過於此，但也最有收穫。由於當時文學生產的數量不少，本論文在研究範疇上將以小說體裁為主。雖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在解嚴之後已逐漸成熟，但近年來在日人作品原典及原始史料的討論上，多半還是受限於日文的語言障礙而未能普遍化。因此，本論文的研究步驟當中，原典的「再閱讀」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再閱讀可以說是一種知識上的會通與整合，也是批評技巧與審美判斷的自我鍛鑄。過程與目標同樣重要，以再閱讀為發點，透過文學理論的穿針引線，重新拼湊文本所刻意彰顯或遮蔽的部分是本論文所欲求的。

就理論運用來說，有幾個取徑方法。第一種是採用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知識(knowledge)與權力(power)的觀點。傅柯的思想發展，扣緊「知識」、「權力」與「主體」這三大軸心，他最主要的論述是考掘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共謀關係，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傅柯認為，「權力」藉由嚴密的凝視與監控機制，使人被規訓為馴服的心靈與身體。他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期所遭受的現代性的滲透，以及現代性所挾帶而來的壓抑。傅柯在《知識考掘學》一書中則對論述(discourse)進行了縝密的分析。傅柯認為，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多半是透過「論述」來鞏固其結構。因此，對傅柯來說，「論述」並不單單只是言說而已，它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集體無意識。人們所有的日常言行舉止都被一種理論結構、一種系統所支配，在這樣的知識系統當中，「論述」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地位。傅柯關於「論述」的觀點，無疑是本論文值得借鏡之處，藉此以分析日本殖民者對於知識傳播的權力結構，以及南方書寫的衍變與南進論述的建構。

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的涉獵則是第二種取徑方法。薩依德(Edward Said)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和《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解構西方作家描繪東方的文學經典，對殖民思維方式進行系統性的理論批評，帶給我相當多的文化啟示。不可諱言的是，薩依德的後殖民理論，針對西方學術的研究策略是具有強大的批判力量。然而，《東方主義》中所謂的東方，大抵是指巴勒斯坦與印度的歷史經驗，與本論文所要探討的範疇並不相同。不過筆者仍希望運用他的知識體系，進而釐清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與南方想像。其中，薩依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提供我解讀日治時期作品時的多元思維。薩依德認為在閱讀西方文本時，必須思考兩個方向：帝國主義和反抗帝國主義的。所謂對位，意指對兩種不同價值的相關知識都能瞭若指掌。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意識到作品生成的主流歷史，也要注意反主流意識形態的、被強迫排除的

各種非主流歷史發展。這其實也涉及到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薩依德(Edward Said)曾在其專書中言及，他受益傅柯的思考良多，雖然他和傅柯的某些思維不盡相同，但是他亦結合了傅柯的權力論述和知識體系的概念去分析殖民論述的建構。而傅柯和薩依德的理論，也是幫助我去解構近代旅者文化視域與帝國論述的最佳工具。此外，可以和傅柯、薩依德的理論相互援引的，還有柯恩(Bernard Cohn)的《殖民主義與它的知識形態》(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⁴⁸，他所提出的觀點也可協助本論文去挖掘文本背後所潛藏的文化意義。

以女性主義(feminism)的視角來探討台灣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權力脈絡，是筆者以往進行文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處理日人作品的台灣原住民女性書寫時，將女性議題透過後殖民觀點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結合，足以突破女性主義只關注自身種族與階級思維的困境⁴⁹，這也是本論文研究方法的第三種取徑方法。在許多西方帝國的旅行者、小說家的文本中，原住民女性的肉體與野性美，象徵了原始、熱情的肉慾。藉由作者的書寫，她們展現了無限的性魅力，其中也投射了男性的性幻想⁵⁰。日本在開始發展帝國的版圖之際，透過政治運作逐步建構了特定的台灣原住民族觀。在通俗化的論述上，一方面他們會刻意凸顯「蕃人」在野蠻性上的「混沌無知」，另一方面則會從現代性的角度來幻想這群尚保持「純真無垢」的未開化人類⁵¹。「蕃女」一向是日人作家興趣盎然的書寫對象，他們對原住民女性存在著許多暴烈與狂野的性想像。將這些刻版的幻想，置放在種族、性別、階級、殖民等錯綜複雜的歷史情境來探索，相信可以開拓女性形象討論的更多面向。

本計劃所採取的研究步驟，一方面嘗試建立台灣文學與日本文學的對話，一方面也嘗試建立文學與歷史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在資料蒐集與文本閱讀的前提下，透過理論的穿針引線，冀望能呈現具有歷史深度的文本詮釋，強調從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等角度，對文本實施一種綜合性的解讀。因此筆者相當認同新歷史主義看待文學文本的態度，它也是本論文第四種取徑方法。新歷史主義主張將歷史考察帶入文學研究，它指出文學與歷史之間無所謂「前景」與「背景」的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它強調文學與文化之間的聯繫，認為文學應隸屬於更大的文化脈絡。新歷史主義著重考

⁴⁸ 關於知識與權力的共犯結構，柯恩(Bernard Cohn)指出，帝國主義在透過知識的權力運作去建構殖民地圖像時，各種針對殖民地的調查是最有力的操作工具。請參閱 Bernard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殖民主義與它的知識形態),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6.

⁴⁹ 請參閱邱貴芬，〈後殖民女性主義〉，收入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店，1996年，頁239-257。

⁵⁰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初版，頁306-307。

⁵¹ 山路勝彥，〈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2004年1月第一刷，頁83。

察文學與權力政治的複雜關係，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參與意識形態的建構。歷史充滿斷層與罅縫，任何歷史都不過是一種論述，是根據當時的時間、地點、觀念建構的。換言之，歷史並不是對史實的單一記載，也不是對過去事件的單純紀錄。研究某個年代的歷史文本，必須同時理解它當時的歷史、文化史，以全然釐清這個文本對該歷史事件或時期的詮釋。用新歷史主義的角度來回顧日治時期的歷史材料或南方書寫，是我看待文學文本的一種基本態度，顯然也是對於詮釋作品一個較為周延的研究方法。

五、章節架構

日本從明治中期開始展開「南進論」，在其文化與帝國主義的發展路線上，透過各種文本逐步建構出一條再現台灣／南方的系譜，南進論述也逐漸成為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的集體無意識。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在探討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與南進論述，分析這些文本的殖民地意象或南方思維以何種策略現身，是本論文的主體架構。不論是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殖民地圖像，或是 1920 年代以降佐藤春夫的台灣原住民書寫，乃至西川滿的台灣歷史文本，一條南方論述的系譜學逐漸在文學地理中清晰浮現。南方的地理位置，是以日本為主體而出發的，涉及到邊陲與中心的概念。從而，「南方」的空間範疇，透過大東亞共榮圈與南進政策的帝國主義宣傳，在日人作品中展演了延伸空間、延長時間的可能。未名的南方，可以是從點到圈的擴張，也是帝國無限膨脹的欲望。台灣／南方的可塑性在日人文學中如何展演，是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如本章第一節研究動機所言，這些帶有繁複暗示的帝國文本，和日本從明治時期以降的南進論述，甚至是昭和時期的文藝政策，在政治對文學的動員關係上形成怎樣的影響？透過本論文各章節的討論，希冀能整理劃清這些問題。

一方面，本論文以再閱讀的細讀方式為研究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也強調文學與歷史學、社會學的接軌。在分析文本上則將研究範疇集中以小說與紀行文學為主。本論文共計六章，除了第一章「序論」與第六章「結論」，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正文的部分，將落實以下討論：

1874 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討伐台灣原住民，也展開對台灣的野心。可以說，「台灣」這個地名，首次對日本民眾造成震撼性的印象，是肇始於「牡丹社事件」。從日治時期日人作家對於台灣原住民題材所展現的關心程度，可以透過「牡丹社事件」與「霧社事件」、「蕃社」與「蕃女」為主題的作品數量看出端倪。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日本逐步建構台灣的認識論。對明治中

期開始發展「南進論」的日本帝國而言，南方的地理方向，是相當明確的；但是南方的形象，則有待各種論述來統合。台灣被當作南進政策的起點，台灣的地理與風土，也極可能轉化為日本人想像「南方」的表徵。明治到大正初期的台灣圖像，主要來自殖民地官吏、人類學者等專家之手。藉由各種專業的官方報告與人種、物種調查，台灣的各種事物開始被認識、被建構。就像一座博物館，鉅細靡遺地全面展示在殖民者眼前。

第二章「認識台灣：1910年代前後官方觀點與民間觀點下的台灣」所提出的竹越與三郎與中村古峽，分別代表了大正時期日人官方觀點與民間觀點對於台灣的想像。竹越與三郎是活躍於明治到昭和時期的史學評論家、政治家，他所完成的《台灣統治志》與《南國記》，投射了帝國無限的欲望；《台灣統治志》顯然是為宣傳殖民政績而寫，《南國記》則明示出作者的南方觀點。而中村古峽在1913年（大正2）來台，當年6月就在《東京朝日新聞》發表了〈到鵝鑾鼻〉。以他發表在日本商業性雜誌《中央公論》（1916年7月號）的〈來自蕃地〉，可說是第一篇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而發表在大眾化刊物的作品。《中央公論》在該期以「世界大觀號」為主題，選錄九篇以各國的「異國情調」為主的小說創作，其中描寫到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旅行的〈來自番蕃地〉，就是標榜代表「台灣」的作品。中村古峽的〈來自番地〉，呈現了近代人的凝視和異國情調的書寫，無疑是作者對台灣原住民的野性想像。中村古峽的台灣書寫，在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有關內地作家的討論，並沒有被提及。或許是因為中村古峽的台灣書寫相當稀少，且這兩篇作品均在報章雜誌發表，沒有收為專書。只有河原功注意到〈來自蕃地〉，但在他的論文中有稍微提及。不過，以文學性和異國情調的元素來看，筆者認為中村古峽的作品，絲毫不遜色於佐藤春夫。尤其是在大正初年，他即以徒步的方式，完成到屏東的鵝鑾鼻燈塔參觀，甚至繞過台灣最南端往東部山區丹社事件的發生地。中村古峽的原住民觀察，也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這亦是本論文在此特闢一節探討的理由，透過中村古峽的原住民書寫，可以窺探出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日本對於台灣的許多民間思維。不過，以台灣原住民題材為外地文學帶來廣大影響的，還是佐藤春夫的台灣紀行作品。

第三章「帝域與異域：1920年代佐藤春夫的南方體驗」，以佐藤春夫在台灣與中國福建旅行書寫為中心。1920年的夏天，佐藤春夫來台灣旅行，這是他生平首次的遠行，途中他還利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到對岸的福建遊覽。佐藤旅台的行程，完全出自當時台北博物館館長森丑之助的規劃，包括到中國也是聽取他的建議而行。透過森丑之助的引薦，佐藤春夫在台灣行程受到當時民政長官下村宏派令的特別照顧，所以在各地獲得盛情的招待。但是在旅行到福建期間，由於語言隔閡以及文化的落差，甚至是隨行旅伴的疏忽，都讓他明顯感受到客居異鄉的寂

寥與不安。從而，在兩地旅行的差別待遇下，他往往特別在回憶文字中肯定台灣旅行的成功。佐藤春夫自己也曾說過，台灣之旅應該是促使他更想深入瞭解「南方」而到南洋群島從軍的契機。

佐藤春夫在返回日本後，從 1921 年到 1937 年之間，陸續發表了多篇與閩台旅行相關的作品，體裁包括了小說、遊記與散文。這些文章的取材，多半來自他的旅行體驗，具有紀行文的性質。透過這些文字不難發現，佐藤春夫筆下的台灣與福建，有著相當殊異的風情，作者對於兩地的觀感亦有頗大的差距。他筆下的台灣，著重在山地原住民的書寫，因此充滿了原始與野性的氣息。關於福建的描寫，則流連在中國民族性的頹廢面，呈現出一種腐敗、衰退的氣味，但是他卻相當讚揚當地的旖旎風光。佐藤春夫後來又三度去了中國，在 1943 年的太平洋戰爭期間，他也曾隨日軍遠赴馬來半島、爪哇等地。透過佐藤春夫的台閩紀行，不僅能夠藉此檢驗近代旅者的文化視域，也可以窺探出他最初的南方印象與東亞體驗。或許可以說，他的東亞體驗是以台灣作為起點，然後逐漸向南方前進。以佐藤春夫在當時日本文壇的知名度，他的台灣相關作品成為南方書寫之典範，不僅開啟了許多日本人的殖民地想像，也影響了後輩作家的南方憧憬。就文學想像而言，佐藤春夫在台灣書寫誠然是一個起點，成功轉化為「南方」意象而被後輩的日人作家接受。其中，中村地平是受到啟發頗深的一位作家。

第四章「彼岸的南方：1930 到 1940 年代中村地平與真杉靜枝的台灣印象」，是以中村地平與真杉靜枝在台灣書寫為研究對象。除了探討受佐藤春夫影響的中村地平之外，也將比較和他關係頗深的日籍女作家真杉靜枝。此外，對於台灣原住民形象有決定性影響力的霧社事件，也是本章重點探討文獻。中村地平從少年時代就對南方懷有強烈的憧憬，受到佐藤春夫以台灣為題材的小說〈女誠扇綺譚〉、〈旅人〉等作品的啟發，驅使他立下南方之行的志向。1926 年，他到台北就讀總督府高等學校，在殖民地度過四年的高校生活，終於得以親近南方風土。中村地平不只一次為文表示，他的南方之行與台灣書寫，都來自佐藤春夫的影響。而另外一位法國作家莫泊桑，也是他在作品中經常提及的詩人，是指引他在南方想像上的重要人物。以中村地平的文學體驗來說，莫泊桑的南方書寫營造了印象式的情感，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則提供一個實踐南方體驗的模式。

對大正時期的作家而言，所謂的南方印象或是南方行旅，多半來自歐洲文學的影響。歐洲在工業革命及都市文明發展之後，許多知識人開始對近代世界展開批判，回歸自然也成為遠離物質生活、尋求心靈寄託的方式。從 19 世紀末期到 20 世紀初葉，歐洲開始對南方產生憧憬而付諸旅行，這些行動已非單純的南方行旅，而是對文明世界的抗拒或逃避。當時有不少的作家與藝術家也投入這股浪潮，而創作了許多南方紀行作品。歐洲的南方文學系譜，和工業革命以降的近代

社會的建構有密切關係，是一種對現代性的否定，也是一種嚮往野性自然、原始風情的文化姿態。歐洲作家的南方旅行文學翻譯到日本後，用文學形式為日本作家提供了一個想像南方的模型，對日本作家的南方印象造成不小的影響。從歐洲文學的南方探險之旅到日本帝國的南方開拓政策，縱使兩者之間的南方憧憬有所殊異，但其實都存在著帝國勢力路線朝向蠻荒開發的背景，也對日人作家的南方書寫有頗大啟示。

1939年，中村地平為了收集小說材料再度來到台灣，在一個月的殖民地之旅當中，收集到不少寫作的題材。1941年（昭和16）所發行的《台灣小說集》，共收錄九篇台灣相關書寫的作品，就是兩次來台體驗的成果。而在1939年和中村地平一同來台的真杉靜枝，此行也是再度造訪台灣。少女時期在台灣有一段不愉快婚姻的真杉靜枝，回到日本以後積極從事寫作，1934年她發表以高雄舊城為背景的小說〈南方之墓〉，描寫一群生活在殖民地南部的日本人身影，在這部作品中的幾位年輕女性角色，分別受到了父權家庭父權的婚姻支配、身體暴力或經濟控制。真杉靜枝在作品中以女性觀點強力批判父權家庭，更認為是殖民地的落後文化氛圍讓日本男性的人性愈加低落。作品末尾，一位女主人公選擇以自殺來擺脫丈夫的監控。真杉靜枝以日本女性的「墳墓」來隱喻台灣，她面對殖民地的心情，顯然和中村地平的南方憧憬有極大的殊異。〈南方之墓〉中的淒涼意象以及對台灣的抗拒態度，也和戰爭時期南進政策所喊出的雄壯口號「要有死在南方的決心」有很大的對話性。而她在戰爭期所寫的〈南方的語言〉，卻對台灣有了一種新的領悟，顯然是響應時局的作品。中村地平後來追隨佐藤春夫的行動模式到南洋從軍，從第四章的討論當中，不僅能夠理解佐藤春夫對後輩作家的影響系譜，也可對照出女性作家的南方書寫和男性作家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

毫無疑問的，南方系譜的建立，需要細緻的閱讀與慎重的研究才能獲致。利用貼近原典的細讀方式，筆者除了把重心放在語言掌握與文學作品的再閱讀，皇民化時期的文學雜誌動向也是關注的重點，近十年以來，日治時期台人作品的討論與研究已漸趨成熟。相形之下，日人作家的文本研究則較匱乏。語言誠然是一個問題，除了研究者主要以日人學者為主之外，文學結集的編輯出版，也多集中在日方出版社。這些作品對台灣學界而言，足以填補目前文學史討論的缺隙。尤其是1940年代西川滿所主導的《文藝台灣》，它不僅帶有強烈的編輯個人特色，而其作家組成與文學生產的風格，皆無法脫離當時南進論述的影響。回溯到歷史現場，當時的日人作家和台人作家或有對峙，或有合作，要詮釋當時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動向，置諸於文學集團來討論更能彰顯其意義。不過，由於他們的作品大都未被翻譯成中文，對於年輕的研究者而言有語言的門檻。此外，這些作家在日本文學史上幾乎名不見經傳，除了中島利郎、河原

功合編的《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東京:綠蔭書房,1998),可以看到一部份的作家介紹與作品解讀之外,極難找到系統性的相關研究文獻,這也是筆者的研究動機。

在文學結盟之外,畫家和作家的相互應援,更是《文藝台灣》的重要特色。這一特點,不僅是這份雜誌的特色,進一步可以說是西川滿個人的美學堅持。他向來講究書籍美編與裝禱,會強調畫家與作家的結合是頗為合理之處。在《文藝台灣》的「普通會員」部分,可以看到許多畫家的名字。這一份名單,充分顯示西川滿不僅要統合文學界,更有意朝向文藝的全方位追求。這些畫家的繪畫或版畫創作,頻繁出現在每期的插畫或美術專欄。《文藝台灣》可以說是日治時期雜誌當中,具體結合文藝兩股勢力並每期刊出繪畫的唯一刊物。因為《文藝台灣》的作家與畫家的組成與作品數量相當龐大,所以第五章「西川滿與台灣場域下的外地文學」的探討重心,除了討論該雜誌的成立經緯,在創作部分將聚焦在「南方」這一主題,分析《文藝台灣》的文學理念與美術特色。

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文學進入被動員的階段,「南方」的地理書寫也有了更為明確的指喻。當時佔據文壇發言位置的島田謹二,以日本內地為中心座標,將日人作家的台灣文學命名為「外地文學」,他的用意除了要區隔內地文學與外地文學的地理差異之外,也有意凸顯外地作家創作「異國情調文學」的獨特性格。而島田謹二認為,真正能落實「外地文學」的作家,就是長期定居台灣的西川滿。第五章的研究範疇,將以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為問題意識,探討西川滿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壇的發言位置,以及他回應島田謹二的文學實踐。1940年發表在《文藝台灣》的〈赤崁記〉是西川滿首次嘗試以異國情調改寫台灣歷史故事的初啼之聲。也是從〈赤崁記〉開始,西川滿開始在作品中展現了鮮明的政治語言。

關於異國情調的討論,島田謹二曾經說過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是典型的異國情調文學,亦符合他本人所提出的「外地文學論」⁵²。日本文化界開始對台灣產生注意力,是在讀到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等系列的台灣關係作品所致⁵³。因此,〈女誠扇綺譚〉不僅開啟了很多內地作家的台灣想像,連台灣的日人作家也深受影響。〈赤崁記〉(1940)無論是在結構或敘事的表現方式上,和〈女誠扇綺譚〉有許多類似的書寫手法。不約而同的,佐藤春夫與西川滿在他們的作品中都選擇以「荒廢」或「蠻荒」的意象去再現台灣。1920年代的〈女誠扇綺譚〉展現了對女體的想像,而1940年代的〈赤崁記〉則營造了國體的想像。異國情調與異色情調的「異趣」,成為西川滿和佐藤春夫共有的基調。透過對少女身體

⁵² 松風子,〈台灣の文學的過去に就て〉(「華麗島文學志」緒論),《台灣時報》,1940年(昭和15)1月號。

⁵³ 請參閱邱若山,〈〈女誠扇綺譚〉とその系譜——ロマン主義文學の本質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佐藤春夫台灣旅行關係作品研究》,台北:致良出版社,2002年9月初版,頁189。

的想像，佐藤春夫披露了旅人的觀賞角度，也傳達了男性的道德思考。西川滿則是以書寫者的身分，企圖成為台灣歷史的代言者，也藉此彰顯了統治者的歷史詮釋權之合理性地位。這兩篇之所以會有如此高的同質性，是一種將台灣「他者化」的書寫傾向。

〈赤崁記〉在刊出後受到不少好評，促使他繼續創作一系列以「記」為形態、取材自台灣歷史、野史、地方史的作品。其中的〈龍脈記〉，更成為西川滿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的藍圖。從〈赤崁記〉開始，西川滿在作品中展現了鮮明的政治語言。〈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則運用大量史料所完成，是西川滿捨棄浪漫主義轉向寫實技巧的創作，以台灣縱貫鐵路的現代化開發為起點，他企圖重新詮釋台灣的開發史與殖民史。另一方面，西川滿所主導的《文藝台灣》，透過畫家和作家的相互結盟，充分展現西川滿結合文學與藝術兩大勢力的企圖。他們的文學與繪畫也正面回應了帝國的南進政策論述。該雜誌的編輯特色與作者組成，展現積極配合官方體制的姿態，也具體反映南方書寫的可塑性與想像性。在日益熾熱的戰爭氛圍下，前進南方的雄飛熱情，也透過這些文藝之筆而燃燒。經由第五章的討論，在 1940 年代佔據官方文藝重要發言位置的《文藝台灣》與西川滿的編輯風格，甚至是他的書寫策略與帝國南進政策的互動，將可得到清晰的脈絡。進而希冀能夠釐清殖民地台灣在日本戰爭期的定位，以及南進論述發展至此的衍異情形。

談論日人作家在 1940 年代的文學表現，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庄司總一的《陳夫人》、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最受矚目。它們完成的年代瀰漫著戰爭的煙硝味，作品散發出來的氣息自然帶有濃厚的政治氛圍，令人輕易就和南進政策產生聯想。葉石濤在為庄司總一《陳夫人》中文版的序中提起：「日治時代在台日本人作家的作品，也是屬於台灣文學的一環。可惜，未受台灣人的重視。特別是取材於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的日人作家的作品，不管他們的立場與意識型態如何，已經成為台灣文學的重要遺產。我以為西川滿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以及庄司總一《陳夫人》最能代表日人作家對台灣的殊異看法。」⁵⁴。葉石濤的發言，有文學者的無限感慨。這三部小說是否「未受台灣人的重視」，筆者尚且不敢妄下定論，但是最基本的問題，應該還是跟語言障礙有極大關係。

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可以說是這三篇小說中最具圓滿結局的作品，描寫能久親王在 1895 年甲午戰後帶領日軍從北到南接收台灣為主題，他以既有

⁵⁴ 葉石濤，〈《陳夫人》中文譯本問世〉，收入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 6 月，頁 3。這三篇小說已全部翻譯，可以用中文的面目呈現。中文版出版資料如下：《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 6 月；《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藝，2004 年；《台灣縱橫鐵道》，台北：柏室科藝，2005 年。

的史料為骨幹，再填補南方想像的血肉，顯然是向歷史借火以取暖的書寫策略。《陳夫人》和《南方移民村》則留下了看似明朗、其實未明的結局。庄司總一的《陳夫人》以內台融合的婚姻為主題，在錯綜複雜的人物安排下，也部份呈現了殖民者眼中的台灣傳統社會風貌。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則是刻畫日本東北地方一群農人遷移到台灣台東廳的關山郡，在窮盡的惡劣環境下，為建設移民村而陷入艱苦奮鬥。

將《台灣縱貫鐵道》、《陳夫人》和《南方移民村》置放在正文的最後一章討論，也在於映襯決戰期的台灣作為南方想像已出現侷限性。《陳夫人》中的女主角安子，因為出身的日本國籍和丈夫的台灣國籍，使她一直活在內台融合婚姻幸或不幸的辯證中，「愛」在小說裡成了解決安子困惑的支柱，但是「愛」真的是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嗎？最後她的丈夫似乎有心帶著安子和女兒前往南方尋求新生。而《南方移民村》的日本農民們，終究也決定離開台灣集體移民南洋。這兩篇小說是南進政策的文學產物？筆者認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台灣作為南進基地的窘境。台灣曾經是日本歌頌的南方樂土，但是在這些書寫中，前往南方的人卻一再碰壁，他們被迫離棄台灣繼續航向更遠的南方，因此南方的界線也只好一再往南推衍，成為敗北者流亡／定居的投奔所在。經由這三部作品，透露出一個訊息：在決戰期階段，台灣已經無法饜足日本的強大慾望，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擴大蔓延，為了美好的願景，前往南方的渴望，成為出走台灣的藉口。台灣的地理意義，終將成為南進政策下，一個被恣肆利用而遺棄的所在。所謂「南方」的概念，至此已經出現無路可進的陰影。從而，「前進南方」還有可能嗎？如果有，往哪裡？